



·中国新诗库·

ZHONG GUO XIN SHI KU

第三辑

周良沛 编选

汪
静
之
卷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·中国新诗阵·

ZHONG GUO XIN SHI FEN

第三辑

曹湜 编选

汪静之卷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中 国 新 诗 库

第 三 辑

汪 静 之 卷

周良沛 编选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《中国新诗库》 第三辑

汪静之 卷

周良沛 编选

*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·发行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)

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
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930毫米 32开本 2.875印张 3插页 1400行

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 000

ISBN 7—5354—0495—2

1.427 定价：1.45元

卷 首

周良沛

汪静之（1902. 7. 20——），安徽绩溪县八都余村人。父母开杂货店，兼贩茶叶到屯溪或上海出售。他六岁上私塾，十二岁学写旧诗，十四岁到武汉在亲戚的茶店当学徒。在私塾深受“万般皆下品”的教育，不屑学商，一再写信向父母要求继续升学，都无效。翌年，母亲贩茶往上海，乘长江轮到武汉看儿子，他又提出同样的要求，母亲非常苦恼，说当个穷书生，一生就完了，做生意，就可以过好日子。母亲回家后，他仍然不断写信要求，又写了十几首七言绝句诉苦言志。父母读了诗，心疼流泪，只好托人送他回家，仍上私塾读书。想到读旧书没有出路，1919年春到屯溪进安徽第一茶务学校读书。因为日本的制茶机没有买到，机器制茶的老师没有请到，课程和普通中学也就完全相同。

“五四”开始，新思潮也在冲击这江南县镇，他读到《新青年》，也学写白话文，白话诗。那时，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校长经亨颐积极倡导反帝反

封建的新文化，“得到当时被称之为‘四大金刚’的语文老师陈望道、夏丏尊、刘大白、李次九的支持。学生施存统又在《浙江新潮》第二期发表了题为《非孝》的文章，这就引起了轩然大波，遭到浙江反动当局的迫害”，“爆发了被鲁迅称之为声势和规模更大的‘木瓜之役’，即轰动全国的‘浙一师学潮’。这次学潮，由于进步师生的坚决斗争，一直延续到1920年春才胜利结束”^①。一师由此也成为南方新文化运动的堡垒。虽然校长与“四大金刚”离开了学校，但叶圣陶、朱自清、俞平伯、刘延陵等先后又到“一师”任教。汪静之这年秋天也和各地慕名者一样，暑假由新安江顺流而下到杭州，进“一师”读书，与潘漠华同班。1920年秋天，冯雪峰也到“一师”，不久，潘漠华、汪静之邀请雪峰、赵平复（柔石）、魏金枝等二十余人，请叶圣陶、朱自清、刘延陵三位师长为顾问，成立“晨光社”，在《浙江日报》上出文学周刊《晨光》，持续了数月。

1921年，《新潮》、《小说月报》，第二年《诗》、《新青年》相继发表了汪静之的新诗创作，引起了当时在上海棉业银行工作的应修人的注意，1922年就写信给汪静之，希望通信联系。以后，书信往来，交换诗作，切磋诗艺。三月，为晤诗友，应修人又请

① 晓冬：《“湖畔社”始末》，《西湖》1982年第4期。

假一周到西湖游春，行前寄上一张着长袍持礼帽的照片，请汪静之认人，接站。

应修人（1900—1933.5.14），他本身就是一首诗。1926年他辞去银行之职，到广州黄埔军校和武汉国民政府劳工部工作。1927年赴苏联学习。1930年回国，在中共中央军委、组织部工作，后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，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。1933年5月14日，他按约定的时间找丁玲，机关已遭破坏，丁玲、潘梓年已遭敌人绑架。应修人一到，埋伏的敌人一拥而上，他英勇地展开搏斗，由于寡不敌众，不愿被擒，从高楼的窗口跳下，壮烈牺牲。他生前爱诗爱生活的热情，与他面对死亡时的态度，不能说是无关的。由于后来全身心地投入到现实斗争，写得也不多，未曾单独成集。但是，要是当时没有他的提议、努力，就很难说有“湖畔社”在文学史上的名字。就是他这次到杭州晤汪静之，听到讲“晨光社”的活动，很感兴趣，又邀上冯雪峰、潘漠华游湖，四人一见如故，“白堤上散步，桃树下写诗，雷峰塔旁吟诗，诗文唱和，快乐无穷”。互相交换看诗稿后，应修人提议将自己的和汪静之、冯雪峰、潘漠华的编成一集，争取出版。由于汪静之的《蕙的风》已经编好交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，而“湖畔”诗友，不可缺一，又从《蕙的风》中选了六首入《湖畔》。这本诗，是友情的象征，同时成立的“湖畔诗

社”，也是友谊的结合，并无章程。

《湖畔》由应修人出资自印，当月出版，在北大及北京、上海各大书店寄售，引起强烈反响，尤其受到青年读者的欢迎。郭沫若、叶圣陶、朱自清、郁达夫、胡风等，都有文或有信祝贺，也是那三年的新诗运动中的一个浪潮。《春的歌集》也是作“湖畔二集”再由修人出资自印。由于《蕙的风》出版，汪静之已小有名气，怕作品没有提高，拿不出去，就没有辑稿进去。1925年2月，应修人在上海仍以“湖畔诗社”的名义，主持、自资出版了16开8面的小型文学月刊《支那二月》，作者队伍也扩大了，有魏金枝、谢旦如、楼建南（适夷）等人在上面发表作品。刊物只出了四期，历时三年之久的“湖畔诗社”，也就停止了活动。

《蕙的风》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在1922年8月一出，即有人认为败坏道德、有伤风化，而胡适、周作人、朱自清、赵景琛等，则加以赞赏，鲁迅更写了《反对含泪的批评家》，给顽固派反击。诗集的轰动效应，更提高了书的知名度。

那时，译诗很少，为了要向外国诗学习，他于1922年暑假到上海中国公学补习英文，暑假后就在上海宏文英文专修学校读书。偏偏家里的生意上连续几年蚀本，1923年父亲贩茶到上海又被人卷款潜逃，终于破产，负了债，无法再供他读书。1924年

春他到武汉，翌年到保定，任中学国文教员。1925年暑假起失业一年，倒成了创作丰收的一年，写作出版了诗集《寂寞的国》（1922—1925年的诗，开明书店出版），商务印书馆出版了《诗歌原理》、《李杜研究》，还写作、发表、出版了小说集。

1926年秋到芜湖教书。10月北伐军攻下武汉，报载郭沫若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，他当即乘外商轮找去，介绍在宣传科任编纂。第二年初夏调任《革命军日报》副刊编辑，兼任劳工部《劳工月刊》编辑。那时，应修人也刚从广州黄埔军校调到劳工部。

“四·一二”后，武汉政府以汪精卫为首，也在准备背叛革命的活动，6月，从北伐前线调部队回武汉镇压两湖工农运动。应修人转移前，要他注意安全，他也转回杭州，失业半年，写了几篇短篇，编成小说集《父与女》，由大江书铺出版。1928年春——1936年夏，先后在上海、南京、安庆、汕头、杭州、青岛任中学国文教员及建设大学、安徽大学、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。商务印书馆于1935年出版了他部分讲义《作家的条件》。

“九·一八”后，国家受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，他编选注释《爱国诗选》、《爱国文选》各四册，前者，上海“商务”在1938年出书，后者，在他逃离上海后，寄香港“商务”出版。

1938年夏逃到武汉找郭沫若，三厅已人满无法安插。一家数口，生活无着。后到中央军校广州分校任国文教官，后随校到贵州独山。通货膨胀，物价飞涨，他另到中学兼了一份课，生活仍觉困难。当时公务员做生意成风，1944年冬敌人侵占独山，他脱离军校，到重庆与人合伙做酒生意。文人做生意，一败涂地。此时，日寇投降，为国家胜利欣狂，为受饥寒威胁一筹莫展，开怀痛饮，大醉大哭。为一家六口，做跑堂酒保，忙于打酒舀豆浆，端菜捧蒸笼。少年时不屑学生意，此时却只能做生意维持生计于乱世！

后来重操粉笔生涯，1946年到白沙大学先修班，徐州江苏学院各教一学期，1947年8月到上海复旦大学任教授。1952年10月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部任编辑。1955年到中国作家协会专事创作。1957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解放后的新诗新作《诗二十一首》。

汪静之是“湖畔”诗友中唯一健在的一位诗人，他又回到西子湖畔，在西子的诗情画意中。虽然他不太写作了，然而，新一代文学青年，又在湖畔，再度亮出“湖畔诗社”的旗帜。新一代“湖畔”诗人的创作，是二十年代“湖畔”艺术的延续和发展？还是以“湖畔”为名的另一路现代艺术呢？这自然只有看他们的作品了。然而，这位“湖畔”老人却在

1982年写了一篇《从爱情诗谈到诗园风景图》说到，鲁迅看过《蕙的风》之后，1925年8月26日曾当面对他说，“青年人有写恋爱诗的权利”，1929年，在“五卅惨案”全国爆发全面的反帝斗争，以及大革命失败，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之后，中国还在白色恐怖之中的年月，11月25日又告诉他：“现在不是写恋爱诗的时候了。”由此，诗人对当代的诗风诗评是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：

爱情诗应该开放，但不能任其泛滥成灾。

决不可“一切为了爱情”；爱情诗“应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”，不可散布庸俗的低级趣味。

我青少年时期，专爱游山玩水写情诗，是不足为训的，现在的青年诗人们应引以为戒。

海涅、裴多菲虽都写了大量的爱情诗，但都写了一些革命诗，对革命作出了贡献。我要向他们学习，写出对社会主义有益的诗，不但赎罪，还希望立功。

可叹近几年竟有“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，不屑于表现自我以外的丰功伟绩”的片面的说法。而我解放之后就立志专作“时

代精神的号筒”，专“表现自我以外的丰功伟绩”。只愧枯笔不生花，难表丰功伟绩的万分之一。我当然梦想能作莎士比亚化的传声筒，但是由于艺术上低能，莎士比亚化不成，只能作席勒式的传声筒，希望聊胜于不屑作传声筒。①

汪静之由爱情诗引起的这番议论，作为从自己创作的反思上来表述对当代诗界的意见，自然是值得重视的一家之言，如果这反思，只有自责，甚至要“赎罪”，就不仅过谦，而是过苛了。

目前，通常称汪静之为“湖畔诗人”，确实是“湖畔”的形成以及这“友谊的结合”中是不可以缺少他的。但是，“湖畔”的《湖畔》、《春的歌集》，若不是应修人就是为了他们的友谊，在编好《湖畔》后硬向他要了六首同题的总共只有十六行的《小诗》，那么，作为“湖畔”的创作标志中，就找不到汪静之的作品了。

目前，说“湖畔”诗人“其特长和在当时起了较大积极影响的是爱情诗”②。其实，主要就是指汪静

① 见《星星》诗刊1983年7月号。

② 《湖畔·春的歌集》，《湖畔社简介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。

之情诗了。而且，这一说法，几乎是以汪代“湖畔”了。朱自清说过，“就题材而论，《湖畔》里的诗大部是咏自然；其余便是漠华、雪峰二君底表现‘人间的悲与爱’的作品。咏自然的大都宛转秀逸，颇耐人思，和专事描摹的不同。”^①

所以说，情诗，在汪静之的作品中，倒是占很大的比重。而且，它在当时一问市，立即取得当前所说的“轰动效应”。

汪静之的第一本诗集《蕙的风》1922年8月出版时，就有朱自清、胡适、刘延陵三位学界名人为之写序，对作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。10月24日《时事新报·学灯》发表了当时南京东南大学学生胡梦华的《读了〈蕙的风〉以后》。胡梦华也是安徽绩溪人，就不知这当中是否因为同乡而对汪静之夹有其它情绪。他攻击其中一些情诗“堕落轻薄”，“有不道德的嫌疑”。接着，章鸿熙（即章衣萍）在《民国日报》副刊《觉悟》（10.30）发表《〈蕙的风〉与道德问题》，加以批驳。胡梦华接着在11月8日发表《悲哀的青年——答章鸿熙君》，内有“我对于悲哀的青年底不可思议的泪已盈眶了”等语，于是，鲁迅便有《反对“含泪”的批评家》这篇著名的杂文。鲁迅先生说道：

① 朱自清：《谈〈湖畔〉诗集》，《文学旬刊》1922年39期。

……胡君因为《蕙的风》里有一句“一步一回头瞟我意中人”，便科以和《金瓶梅》一样的罪：这是锻炼周纳的。《金瓶梅》卷首诚然有“意中人”三个字，但不能因为有三个字相同，便说这书和那书是一模样。例如胡君要青年去忏悔，而《金瓶梅》也明明说是一部“改过的书”，若因为这一点意思偶合，而说胡君的主张也等于《金瓶梅》，我实在没有这样的粗心 and 大胆。我以为中国之所谓道德家的神经，自古以来，未免过敏而又过敏了，看见一句“意中人”，便即想到《金瓶梅》，看见一个“瞟”字，便即穿凿到别的事情上去。然而一切青年的心，却未必都如此不净；倘竟如此不净，则即使“授受不亲”，后来也就会“瞟”，以至于瞟以上的等等事，那时便是一部《礼记》，也即等于《金瓶梅》了，又何有于《蕙的风》？①

这里提到的《一步一回头》，全诗只有三行：

我冒犯了人们的指摘非难，

① 《热风》，《鲁迅全集》卷一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。

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，
我多么欣慰而胆寒。

如果说，引起对“湖畔”争论的热点是情诗，那么，由胡梦华对《一步一回头》的发难和鲁迅先生的反击，就应该是热点中的热点，是新诗史上的一则佳话了。胡适曾说这三行“就是很成熟的好诗了”。随着，他就提出这么一个问题：“我读静之的诗，常常有一个感想：我觉得他的诗在解放一方面比我们做过旧诗的人更彻底的多。当我们在五六年前提倡做新诗时，我们的‘新诗’实在还不曾做到‘解放’两个字，远不能比元人的小曲长套，近不能比金冬心的自度曲。我们虽然认清了方向，努力朝着‘解放’做去，然而当日加入白话诗的尝试的人，大都是对于旧诗词用过一番工夫的人，一时不容易打破旧诗词的镣铐枷锁。故民国六七八年的‘新诗’，大部分只是一些古乐府式的白话诗，一些《击壤集》式的白话诗，一些词式和曲式的白话诗，——都不能算是真正的新诗。”不久，“一班少年诗人出来”，胡适还特别提出，“静之就是这些少年诗人之中的最有希望一个”，“他们受的旧诗词的影响更薄弱了，故他们的解放也更彻底”①。

① 胡适：《〈蕙的风〉序》，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。

这，无疑是“湖畔”，是汪静之在新诗运动中的一大贡献。1922年亚东版的《蕙的风》，收有一首《非心愿的要求》：

愿你不要那般待我，
这是不得已的，
因你已被他霸占了。
我们别无什么，
只是光明磊落真诚恳挚的朋友，
但他总抱着无谓的疑团呢。
他不能了解我们，
这是怎样可憎的隔膜呀！
你给我的信——
里面还搁着你底真心——
已被他妒恨地撕破了。

.....

他凶残地怨责你，
不许你对我诉衷曲，
他冷酷地刻薄我，
我实难堪这不幸的遭际呀！
因为你已被他霸占了，
这是不得已的，
愿你不要那般待我——
一定的，

一定不要呀！

这首诗在1957年“人民文学”版的《蕙的风》已改题为《你已被他霸占》，诗句作了很大的调整：“因为你已被他霸占/我们不能再做朋友/我们虽是光明磊落/但他总抱着无谓的疑团/你给我的信和照片/已被他妒恨地撕破……。”当然，泛泛而论，作者后来为追求语言的“纯净”而作的修改，自然也应该看作为诗之所为，但是，从具体作品表达的特定情景和气氛讲，倒是初稿为好。那些看来没作什么修饰的语言，倒更接近这“不幸的遭际”者的心态和语态。确实是“受的旧诗词的影响更薄弱了，故他们的解放也更彻底”。也许是由于同样的原因，“湖畔”诗人有的作品，还颇具“现代”诗风，当中，汪静之虽然还特别注意研读海涅的爱情诗，那却是他的主要作品《蕙的风》出版之后的事情了，因此，在“湖畔”诗人中，汪静之的作品还没有多少外国诗的影响。同时，在早期白话诗多追求解放的随意、自然时，汪静之还很少有散文化之弊。

朱自清在《蕙的风·序》说汪静之——

他有诗歌底天才；他的诗艺术虽有工拙，但多是性灵底流露。他说自己“是一个小孩子”；他确是二十岁的一个活泼泼的小孩